

《山寺暮》的版本形态与版本价值

□张元珂

1937年6月,严文井的第一部散文集《山寺暮》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该书5月15日付排,6月15日刊行,出版周期为1个月;为靳以主编的《现代散文新集》(共12本)之一种;首印2000册,定价3角;封面为120克铜版纸,大小为17.3厘米×12.3厘米;杏黄色封底,白色字体“山寺暮”横排中间。初版本无序跋,内收《山寺暮》《黑色鸟》《长城旅客梦》《给匆忙走路的人》《平原的谣曲》《小雄及其他》《世故的小丑》《秘密》《阳光的记忆》《风雨》共10篇。其中,尤以《风雨》影响最大。如今留存于世的初版本已极为少见(中国现代文学馆唐畏文库、巴金文库各藏一册),又由于该书为小开本(“袖珍本”),薄薄一册,便于携带,其版本收藏价值较为珍贵。

1983年9月,《山寺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增订再版。首印12000册,定价0.45元。浅叶绿色封面,封面大小为16.2厘米×11厘米,上画晚秋荷叶,粗线条勾勒,别有一番“暮”之意味。书名由吴祖光题写,“山寺暮”竖排封面左上侧。整体上看,再版本的封面设计要优于初版本。再版本除保留初版中的篇目外,又收入《三个晚上》《枯黑的手》《世界一点也不稀奇》《仅仅写了“一天”的日记》《谈悲衰》《人与猫》《春夜过黄河》《旅行的开始》《我吃了一串葡萄》等发表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作品。卷首有作者1936年相片一张,卷末有《附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涟漪》和《再版后记》,现留存于世的再版本较多,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尤其常见于孔夫子旧书网,其中不乏作者签名本、赠送本。

《山寺暮》的收藏价值越来越被看好,有两方面可供说明。一、良友初版本现已进入版本拍卖市场,且市值成倍增长。其中有两本曾出现于孔夫子旧书网,皆为八五品相。一册以起拍100元,终拍530元的价格被拍走。从2011-08-22 21:39:07到2011-08-25 21:05:00拍卖结束,出价达44次之多,以此可窥见竞拍之激烈;另一册现仍在挂牌中,标价1000元,版本的稀有性决定了其不愁买家。二、再版本中的签名本成为藏家的新宠。文人之间彼此题名、赠书既是传统,也是交流方式。现流通于市面的非签名再版本较多,价格基本在10元以下,但作者签名本,尤其是赠给名家的签名本,则因其无形的附加值而出现了几十倍的增长。我在网上见到过两本:一本是赠给李纳、朱丹夫妇的,题赠时间为1984年2月23日;另一本是赠给周明的,题赠时间为1984年1月14日。李、朱、周都算文化名人,书价随之猛涨,也合乎情理。前者现已删除,具体价格已查无对证;后者在孔夫子网标价为500元,其价格已接近初版本的拍卖价了。这都说明,1983年带作者签名的再版本已越来越引起收藏家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演,非签名再版本肯定会成为收藏的“热点”,因为“小开本”、吴祖光的题字、有意味的封面设计等等都赋予再版本以物质形态的独特性。

《山寺暮》的初版,展露了青年严文井的文学才华,初步奠定其散文家的地位。初中时代,他广泛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蒋光慈、郁达夫等新文学名家的作品;高中时代受到“新感觉派”影响,从《现代》中接触到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并以其技法开始练笔;在北平图书馆当小职员时代(1937年3月辞职),他广泛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全面开拓了视野;1935年后,受到沈从文、萧乾、靳以等京派文人的无私帮助和慷慨提携……这都可表明,青年严文井的成长及文学创作,更多受益于新文学精神的哺育与引导。而11岁时受到国语老师表扬的作文《春游》,14岁时写的纪念早夭的七弟的《表弟之死》,以及以笔名“青蔓”发表的《三个晚上》《枯黑的手》《晨行》等作品,都可见出青年严文井在文学上的悟性和才华。早期的散文皆为有感而发,不拘形式,达意含蓄,文字精练,透露出青年人的朝气和文体实验的锐气。1937年,按章靳以要求,他从早期的作品中精选了10篇文章,结集出版。初版本里的这些文章可看作是其对早期文学才华和创作成绩的一次集中显示。

《山寺暮》的初版,显示了京派文人之间的良好生态。收入这个文集里的文章,此前多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武汉日报·文艺副刊》。这与沈从文的举荐,萧乾、凌叔华的扶持分不开。他们合力推介一位年轻作家,并不遗余力地在创作和发表方面给予指导、帮助,特别是沈从文写信劝导其“不要写得太多太快”、“多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的教诲,更是让严文井谨记并受益一生。至于沈从文每一两月就召集他们在北海或中山公园喝茶、交谈的经历,则更是一段文坛佳话。1937年,靳以严文井出版了其文学生涯中的第一本书《山寺暮》,这对严文井的影响自是不小。而萧乾对严文井的文学影响更是直接而深远。正是萧乾不遗余力的推荐,其散文《风雨》才被出版家赵家璧收入《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选》。以上论述可以合并简化如下:严文井向名刊、名家投稿→投给沈从文,但被其弃用→沈从文向萧乾推荐稿→萧乾采纳、发表→萧乾将《风雨》等文章推荐给赵家璧→赵家璧将之纳入选本。它将(作者)创作、(作品)发表、(流通)出版、(读者)接受等四个要素的功能演演到了最佳效果。置身于这个流程中的严文井及其作品得到最大化地传播。

当然,更凸显《山寺暮》地位的,还是它的艺术价值。这些作品以飘忽的意象、自由的结构、不断跳跃的情绪和唯美、诗意的文字,既彰显了现代文学语言(特别是其中的象征、隐喻、通感)向内指涉的魅力,也显示了“美文”这种文体在1930年代多元发展样态中的一种可能向度。《山寺暮》《黑色鸟》《长城旅客梦》《阳光的记忆》,都像极了何其芳《画梦录》的风格。在这几篇作品中,事物的有形与无形、情感的可言与不可言、精神的“此在”与“彼在”,更多以“诗歌”方式呈现;《秘密》《小雄及其他》《世故的小丑》多用小说的笔法,有故事、有人物、有场景、有对话,特别是那些有寓言意味的章节和含蓄抒情、细致达意的段落,则更接近日常生活的表象和质理;《给匆忙走路的人》《平原的谣曲》则分别具有哲理散文和抒情散文的品质,这种写法更接近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散文传统;而《风雨》共有14个章节组成,各章内容互不关联,整体样态(形式)近于小说,但写法却是散文的。而从个别章节、句法看,它又是诗歌或散文诗的质地。总之,诗歌中的抒情性、小说中的故事性、最前沿的欧美技法(比如“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文体要素非常明显地内含于他的这些名为“散文”的作品肌理中。这综合生成了一种效果——表达的纯粹之美与作家的内在心性互为表里,结构的形式之美与丰富的象征意蕴相得益彰。

《山寺暮》的出版,也宣告了严文井唯美至上艺术时代的终结。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在启蒙与救亡、个体与集体之间,后者对前者的要求越来越峻急、合理、合法。此后,包括严文井在内的“小京派”们奔赴延安,并在那里从事抗战文艺工作,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也是一部分有志青年心向往之的事。然而,对于严文井、何其芳、卞之琳这类小知识分子作家来说,那种沉溺于个体诗艺和纯粹精神的审美思维已经与延安的意识形态要求不相符了,故创作转型是必然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的创作和出版,则标志着其身份和审美转向的基本完成。但他并没有沿着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而是另辟蹊径,将视角和精力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山寺暮》的再版,也是预示文学“内转”时代到来的前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文学的向内转,即从内部感觉和体验来把握和形塑外部世界,并以心理学意义的时空观念,经营篇章结构,这样,语言、主题、情节等等都不再据守传统文法规则,而表现为突出的个体化特征。虽然文学的主体性,向内转的整体风尚,在1985年后才逐渐显现,但其先期表征已在创作和出版领域内发生了。文学创作中的“地下文学”、“朦胧诗”自不必说,而在出版领域内,旧作再版和译著初版史上更是走在了这种思潮的前头。具体到《山寺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再版本已经视同为再创作了,这不仅因为里边重新收入了10篇文章,从而改变了初版本的本初样态,还因此版本的存在与1980年代前期人文学观念和文学本体论的再次萌发构成了某种关联。何以这样说?首先,《山寺暮》的再版是新时期出版环境渐趋开放的结果。其次,再版本中的20篇散文,无论内容和风格,确实与文学“向内转”后所展现的文学脉象有更多相似性。比如,在《我吃了一串葡萄》中,主体的自我分裂,“我”与影子的相互驳诘,这与在80年代文学中屡屡出现的生者与死者、人与灵魂之间的对话场景何其相似。早在30年代,严文井就已经实验过这类现代艺术技法,其审美体验与语言实践的现代性,也可谓先锋而前卫。如果照此思路一直写下去,谁又会否认他不会成为《画梦录》时代的何其芳呢?

我的导师严文井

□竹 林

得一天好像都在饥饿的煎熬中。可自从我当上了严文井的学生以后,这种煎熬感就没有了,因为每次从导师家出来,我都吃得心满意足。

中国的1980年,依然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而一代青年的饥渴,是从头脑到身心全方位的。我的导师给予我的关怀与支持,也是全方位的。

就在这一年,举行了全国儿童读物评奖。文井导师是评委会主任。虽然我对这类事从来闻不问,也一无所知。但我原单位的那些秋后算账派却不肯闲着。他们生怕我有作品入围——因为我的一本出版不久的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除了文井导师以外,也受到了儿童文学界的几位前辈如金近、陈伯吹等人的好评。按说,参评作品要由各出版单位推荐的,我那本小书正是上海少儿社出版的,要排斥我,也很简单,不把我的作品送上去参评就够了。可他们偏偏还不放心,又搞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到文井导师那儿去告我的状。罪状是我企图打着文井导师的名义招摇撞骗。一向温文谦和的导师突然大声说:“明明是你们刊物的人写信来要求发表,我没同意,怎么这也成了竹林的罪状!你们为什么要与一个青年人这样过不去?她最近写了一篇很好的小说《网》,是在我眼皮底下写出来的,我虽然也长胡子,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替她执笔!”

导师告诉我这些事时显得很气愤,也许正是因为忍不住气愤他才跟我说说的吧。

让我意外的是,我那本小册子竟也评上了一个三等奖。但是我没觉得开心,因为听说奖状和奖金都由获奖作品的出版社颁发,也就是说,那位领导如此整治我,到头来我还要向人家弯腰鞠躬,接受人家的恩赐。

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对导师说,我不去参加了,我情愿不要这个奖,也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我以为导师还会像往常那样支持我,不料他竟有些生气,一下子严肃起来:“评奖不是哪个人的事,奖状也不是他个人发给你的,但不去领奖却是你没有度量。”

许多年以后,上少社的一位很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参加那次儿童文学评奖的评委向我透露了一个情况。原来,出版社并未将我的那本儿童散文集送去评选,但评委中有人提名(按规定,评委和各地作协都可以提名的),而且一致认为可以入围。他们请示文井导师。文井导师说:“评奖是为了评出真正的好作品,为了文学事业,符合标准的不要怕阻力,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不能拉进来。不要让人家以为是我的百年好受了照顾,但也不应该因为是我的学生而受排挤。”

我想,因为这样,我那部作品终于评上了一个

三等奖吧。

往事如烟,丝丝缕缕仍旧萦绕在心头。

导师处事就是这样的严肃认真,然而,在生活中,他是十分亲切幽默的。他的谈话不时迸射出智慧火花。那时的他总是显得思路敏捷、分析问题尖锐而深刻,一点也不像一个老人。

我的同学高尔品从不肯轻易佩服什么人的,然而一次从严文井家里出来,他很惊讶地说:导师怎么比我们还要思想解放?这在他就是至高的评价了。以后,每每说起导师时,他口里都是溢美之词。去导师家也成了我们盛大的节日。他口才好,跟导师交流和交锋的总是他。我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享用美妙精神大餐。

往往谈兴正浓时,厨房里飘来一阵阵香味,少顷,菜肴一盘盘上了桌,甚至还有酒。

跟导师对酌的也是高尔品。文学从沙发转移到了餐桌,在酒香中发酵。

每样菜都可口,而我最喜欢的是师母烧的红烧肉,油汪汪亮晶晶,入口即酥。

高尔品也是嗜肉之徒,有时,在去导师家路上我们俩就咕咕起来,今天不晓得师母会不会烧红烧肉?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的,师母得攒多少肉票,才能烧这么一碗红烧肉啊!我们真是太不懂事了。

可我们也真心想着要报答导师的。我以为最好的报答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好的成绩,好让我的导师引以为荣。但现实是残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境遇不好,成绩也平平,因此有机会去北京看望导师的次数也不多。

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女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开研讨会前,我兴冲冲地提出邀请文井导师参加。可我的责编告诉我,严文井年纪大了,在家休养,类似这样的活动他都不会参加的,我们也不便去惊动他。我一听便有些惶恐,不再坚持已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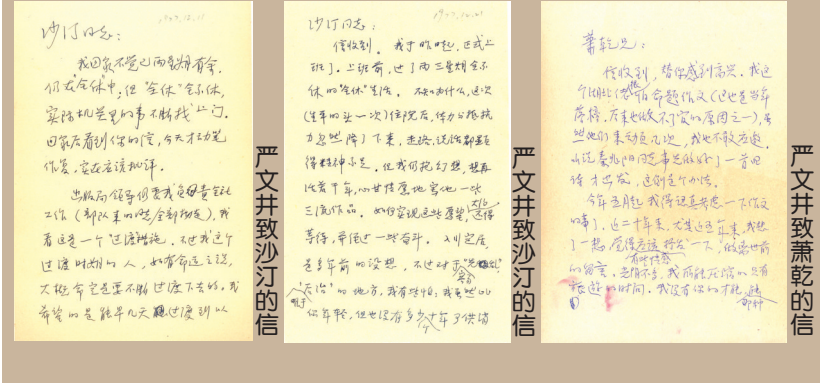
又过了几年,我有机会来到北京,和萧乾先生一起去看望导师时,才知道,虽然我不成器,可导师对我的创作情况一直关注着,对那次未邀请他参加《女巫》研讨会,还“耿耿于怀”呢。

我终于悟到,人的一生能出多少书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要诚恳、正直,富有宽广的胸怀和爱心。这一点,在导师第一次给我写信时,就以他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了。

这是我和导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时间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时光流逝,人间如梦,20多年一霎间。今年正是导师的百年诞辰。每念及导师,我就会在夜空中寻觅明朗的蓝天,因为我依然相信,在那里,导师的眼眸正含着亲切温暖的光芒,在注视着我。

严文井先生的几封亲笔信

□许建辉



有些情感应该抒发一下,做离世前的留言。光阴不多,我所能压缩的只有旅游的时日。”这种夕阳衔山而文债如山的焦灼,其实早在8年前他写给沙汀的两封信中就有流露。在1977年12月11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的病,从目前来说,不是什么胃癌,但总是被当作嫌疑犯看待了一阵。所以,心里不免有些着急,着急的不是老与死,这二者并不可怕,而是有些小东西未写出来,如之奈何!”“我希望的是能早日渡过渡到以写作为主要行业,否则,吃了人民的大米、小米几十年,总觉得有些说不过去。”在同年12月21日的信中他又写道:“这次(生命的头一次)住院后,体力与抵抗力忽然降了下来,走路、说话都显得精神不足。但我仍抱了幻想,想再活若干年,心甘情愿地写他一些三流作品。”前后3封信,严文井先生反反复复表达着一个心愿:只争朝夕,文债偿债。而且,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念念不忘,居然用“我欠的债”四个字做了自己散文绝笔的标题,赫然昭示出他一生一世的最牵挂!

另外3封信则只谈创作不关其他。它们分别写在印有繁体“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人民文学社”字样的专用信笺上,一看即知是1950年代的产品。“五月十四日”信,谈《淘金记》,5页,计1213字。先给作者撑腰打气:“我认为你是现实主义的。你的简练的文字,足以准确的再现生活。”再说作品的缺点毛病:“因为其讽

刺‘不如果戈里明快’而‘妨碍了普通读者’,因而提醒沙汀要面对‘具有相当程度文学修养的读者在我们中国并不很多’这个事实,建议《淘金记》可以用‘更强烈的夸张’,让‘阴暗里透出一线光明’,‘绝望里透出希望’,这样‘即使不是会心的读者,他们也会容易得到一些东西’。”“五月十六日”信,也谈《淘金记》,3页,计700字。这是代沙汀向胡乔木进行征询之后,专门写信向沙汀转达的意见汇总:“他(指胡乔木)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艺术才能的作家,很有表现生活的能力。他感觉《淘金记》有两个长处:一、是对反动社会做了无情的讽刺,给他们以打击;二、生活表现得详细,很突出,可以作为地方风俗书来看。”“五月廿八日”信,谈《堰沟边》,5又1/2页(加上背面写的半页正好6页),计1605字。严文井在信中首先庆贺沙汀“长期沉默后的第一次艺术收获”,然后写道:“这作品我看过后,还找赵树理、立波两人看过,大家的印象,都认为是一篇好作品,写出了农村中新人物的新的品质,主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字是朴素简练的,比较容易看懂。”同时,他又综合了赵树理和周立波所谈,条分缕析写出了“仅供参考”的六点修改意见。结尾处又特意缀上一笔:“我已告知编辑组,把它列入‘七月号’的发稿计划中了。”

或许,作为一位极富创作才能的作家,如果严文井先生当年不要疏离创作,不要让庞杂的事务性劳动吞噬自己的宝贵时间,那么他的文学成就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严文井。导师是讲习所为各个学员指定的,都是国内的名作家,我觉得自己真是时来运转了。

当时,我写了一部名叫《生活的路》的长篇习作,给自己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书稿完成于1977年,小说的整个基调那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悟,跟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调子格格不入。稿子在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之间辗转、退回,最后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先肯定稿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我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一番修改,不久听说稿子交到社领导那里了。后来听见传言,说书稿在人文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大毒草!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上海的一家少儿出版社。因为我写这部书,少儿社曾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批判,还罗列了我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严重等许多罪状。我连连做噩梦,总是梦见严文井把我的书稿枪毙了。自从我挨了批判以后,能否出书,对我就有了一种生死存亡的意味了。我们的领导一直扬言要对我“秋后算账”,如果我的书因为是大毒草而不能出版的话,那么就证明了对我的批判完全正确,“算账”不必等到“秋后”,马上就要来了。而这“账”是政治账,它的后果不堪设想。

但我读过严文井的作品,喜欢他的《小溪流的歌》,也非常敬佩这位儿童文学的前辈。我想,这么一位有纯真童心的老作家,也许会听一听我的倾诉。

我决定给严文井写一封信。我在信中如实倾诉了自己的心声,甚至连自己做的梦都写上了。我最后请严文井读一读我的这部书稿,看它究竟是不是大毒草。严文井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他说,书稿他就不看了,他等着看制成品。后来,稿子到了总编辑韦君宜那里。鉴于当时的情况,韦君宜以她在政治风波中锻炼出来的老练成熟和对真理的执著,想出了一个妙招——与孟伟哉一起将我的书稿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内容提要,请“上面”审查。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是胡耀邦同志正在中央全力奔走呼吁拨乱反正的时刻,这个“提要”终于受到了重视,于是便有了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首都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部分中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当时文艺界最高层领导茅盾对我的那部书稿作了热情的肯定。茅盾先生还点名要我上主席台去见见面。受尽挫折的我,好像从无边的黑暗中突然被带到了阳光明媚的户外,心理状态根本无法适应。因此任大家一声声催促,我都没敢走上台去,失去了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与文学大师面对面的机会。

现在竟然能成为严文井的学生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惊喜!

在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和另一个同学高尔品一起来到东总布胡同60号严文井的家,规规矩矩地做了文井导师的学生。

那时文讲所有一个奇怪的制度,就是周日只开两顿饭,早饭延迟,晚饭提前,只少了一顿饭,却弄

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藏有严文井先生亲笔信6封,其中5封致沙汀,1封致萧乾。后者如下:
萧乾兄:

信收到,替你感到高兴。我这个湖北佬很怕命题作文(这也是当年落榜,后来也做不了官的原因之一),虽然他们来动员几次,我也不敢应诺。听说秦兆阳同志事先做好了一首旧诗才出发,这倒是个办法。

今年五月起,我得认真考虑一下作文的事了。近二十年来,尤其近五年来,我想了一想,觉得有些情应该抒发一下,做离世前的留言。光阴不多,我所能压缩的只有旅游的时间。我没有你的才能,那能将自己的见闻随时写出漂亮文章的能力。这方面我欠了不少债,我也想在将来的作文里还一还。当然,那就不能用游记或报告文学这一类形式了。

请注意身体,胜利归来。

文井

八五年四月廿九日

这封信指涉的史实是:1985年5月,武汉文艺界举办黄鹤楼笔会,盛邀萧乾、秦兆阳等文坛大腕出席,“湖北佬”严文井先生自然也在受邀之列。但被“动员几次”,他终“不敢应邀”。之所以如此,表面原因是“很怕命题作文”(以信文分析,笔会可能会要求莅临者都要留下一篇文章,或游记或报告文学),实际上是为节约时间,好尽量多码出一些久蓄于心的文字来。

写这封信的时候,已是古稀之年的严文井先生,已经在文学园地耕耘了半个多世纪;18岁开始文学创作,20岁以“严文井”之名发表作品,22岁出版散文集《山寺暮》,26岁出版第一部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29岁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

黄鹤楼笔会前后,正是严文井先生的新旧著作被众多出版社争相初版、再版之际,新中国儿童文学泰斗的光环,正罩在他的头上熠熠生辉。此时若应邀莅会往江城一行,其情景正可谓衣锦还乡风光无限!可是他却气定神凝安居斗室,呕心沥血爬格子偿债还愿。一封手书,写出了他不善名利不媚俗骨的淡泊与高洁。信中没有一丝一毫功成名就后的志得意满,只有老马长途债务缠身的无奈与沉重:“我得认真考虑一下作文的事了。”“这方面我欠了不少债,我也想在今后的作文里还一还。”“觉得